論　著

戰爭記憶與殖民地經驗：開原綠的臺灣日記*

洪　郁　如**

摘　要

戰時日記以日常形式記載非日常，同時也在非日常中書寫日常。日本殖民地統治的政治社會結構與戰爭動員交疊下的重力，又可能出現在殖民地戰時日記書寫隱藏的日常與非日常之緊張關係中。

* 本文初稿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戰爭、記憶與性別」工作坊（2012 年 12 月 6 日），會上評論人陳文松教授以及與會學者提供許多寶貴建議，本人受益匪淺；並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高見，在此特表謝意。另外，本文的資料蒐集與整理，也要感謝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生黃耀進同學的協助。

** 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教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本論文以日本女性所遺留一冊書寫於 1944 年的臺灣日記作為分析對象，試圖從日本帝國史⁄殖民統治歷史批判中尋找新的思考可能性。[1] 日記書寫，如何記憶戰爭與殖民地經驗，經常取決於日記作者在性別、政治、世代等結構中的「位置」。首先就性別位置而言，相對於日本男性在戰場留下的多數的從軍日記，日本女性在後方書寫的家庭日記所記錄的意義為何？其次以政治位置來看，當這個後方場景設於日本帝國殖民地臺灣，臺灣社會史可以用怎樣的觀點處理日本帝國殖民史的一個記憶片斷。最後以世代位置觀之，家族成員如何面對日記，家族史如何解釋或整合戰爭記憶與殖民地經驗？而研究者在家族紀錄與所謂史料之間，性別政治與世代之間，又該如何意識與面對自己的位置。本文藉由這些穿插交錯於日記內外，牽涉寫作者與閱讀者，纏繞支配與被支配，跨越戰前與戰後的不同位置，個人恬淡日常與日本帝國殖民史和戰爭之間，將呈現另一種形式的批判與對話。

關鍵詞：戰爭、日記、空襲、電影、日本帝國

前言：「戰爭日記」與「殖民地日記」

所謂「戰爭日記」在日本近代史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近年來特別受到矚目的，一是前線士兵的從軍日記，[2] 中日

1 日記主人開原綠女士是筆者婆婆裕子的母親，關於尋獲日記等經過將於文後詳述。

2 例如：小野賢二、藤原彰、本多勝一編，《南京大虐殺を記録した皇

戰爭乃至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士兵在戰場遺留日記數量甚多；另一是後方大多由女性所留下的日記，內容多記載空襲與戰爭生活的體驗，兩者皆為日本重建民眾史與女性史觀點提供了重要線索。就性別角度觀之，日本史學研究者西川祐子舉其雙親遺留下的日記為例，指出同樣是被戰爭動員，但在性別角色差異之下，父親在前線的從軍日記與母親在後方的育兒日記，呈現了兩個彷彿毫不相干的世界。[3] 但總體而言，性別議題雖然進入戰爭日記的研究領域，殖民地論述卻不在場。戰爭日記的研究侷限在以戰後狹義的日本人為對象，並未將「大日本帝國」領域內的外地住民與異民族成員納入視野。

「帝國記憶」的脫落，顯然是日本學界有關戰爭日記先行研究的一個重大缺憾。戰後日本史學研究的關切重點，在於「戰爭批判」，而不在「帝國批判」。「去戰爭（脫戰爭）」和「去帝國（脫帝國）」[4] 兩種緊密相連的思考議題之間，

軍兵士たち：第十三師団山田支隊兵士の陣中日記》（東京：大月書店，1996）；榊原政春，《一中尉の東南アジア軍政日記》（東京：草思社，1998）；藤井忠俊，《兵たちの戦争：手紙・日記・体験記を読み解く》（東京：朝日新聞社，2000）；茂沢祐作，《ある歩兵の日露戦争従軍日記》（東京：草思社，2005）。另外翻譯為中文出版的有：荻島靜夫著，袁定基等譯，《荻島靜夫日記：一本遺落在中國的日兵戰地實錄》（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3 西川祐子，《日記をつづるということ——国民教育装置とその逸脱》（東京：吉川弘文館，2009），頁 180-184。

4 陳光興曾提出「去帝國化」(de-imperialization)概念，對東亞政治文化進行批判與省思。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臺北：行人出版社，2006）。該書指涉廣泛，包括了盛行於各歷史時空的美、日、中等新舊帝國的勢力與思想。

存在著斷裂的現象。做為一個研究主題的「殖民地日記」，在日本近代史研究中長期缺席，與日本史學界長期以來對「帝國史」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見解分歧有密切關聯。相對於大英帝國的帝國史領域研究之規模，對於殖民地日人社會的研究，或是帝國內人流物流與制度之整體研究，都是較為晚進的研究領域。戰後數百萬人流歸回日本本土，理論上應該有不計其數的「殖民地日記」散落民間，這些記載戰爭的日記，同時也是記述日本帝國後期的重要民間文書，卻很少被正式提起或討論。「殖民地日記」作為一個帝國研究⁄殖民地研究文本，重要性自然無庸贅言。就臺灣史研究而言，學界很早就注意到「殖民地日記」對殖民地史研究的重要性。[5] 原總督府官僚、各級公務員包括警察系統、教育機構的關係人物所留下的日記，都極有助於考察殖民地政經政策的表裡兩面。[6] 相對於這些具有社會頭銜的公職人物，包括本文日記主在內的所謂在臺一般日本民眾日記，則公開者甚少。[7]

---

5 就臺灣殖民地時期相關日記史料與研究而言，臺灣史學界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為中心，近年不斷從事日記的發掘、出版與解讀。比如林獻堂的《灌園先生日記》、張麗俊的《水竹居主人日記》、《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黃旺成先生日記》、女性方面如《楊水心女士日記》等。另外具代表性的日記研究成果有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

6 近年有近藤正己等人對高雄州知事內海忠司日記進行解讀與深入研究。參見近藤正己、北村嘉恵、駒込武編，《内海忠司日記(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2）。

7 以下出版物嚴格來說，亦屬任公職者的殖民地戰爭日常紀錄。塩澤亮繪著，張良澤翻譯，《從臺中雙冬疏散學校到內地復員：一位臺北女

本文所要分析的開原綠日記，以其時間、空間特質而言，同時兼具以上「戰爭日記」與「殖民地日記」兩種性質。在臺日人民眾的殖民地日記甚少公開，其原因至少可能有以下幾點：第一，被遣返日本（引揚）時未攜帶回國。如本文所述日記主，在遣返時帶回許多家族照片，據其生前表示，相簿其實也是被禁止攜帶的物品，因為是自己家族在臺灣的珍貴紀錄，她偷偷將這些照片藏在棉被裡，好不容易才帶回日本。雖然日記主在生前沒有提到這本日記的存在，推測應該也是以同樣方式攜回。第二，佚失。在日記主去世之後，若無特別留意，家族往往無意地丟棄。開原綠的這本筆記本，也是她過世後，女兒在處理母親遺物時無意中所發現，而得以幸運保留。第三，日記主家族的顧忌。這又包括(1)日記中的個人隱私與牽涉的人物評價、人際關係是否應公開等敏感問題，(2)私人文書的公開意義為何，以及(3)外界對先人可能產生的批判等等，日記主的家族往往抱持若干疑慮，抑或因家族成員間未能達成一致見解而無法公開。

戰時大量徵調男性的結果，「殖民地」的「戰爭日記」，許多出於包括臺灣人與日本人女性之手。臺灣女詩人杜潘芳格在日本出版的日記，[8] 與本文考察的開原綠日記，書寫時期幾乎一致，居住地區也極為鄰近，本文也略將二者做部分

子師範學校教授在戰爭末期的紀錄》（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另外，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收藏有，在臺擔任警察職的吉岡喜三郎日記等相關文書、公學校訓導平井棟日記等。

8 杜潘芳格著，下村作次郎編，《フォルモサ少女の日記》（東京：総和社，2000）。在日本出版的杜潘芳格日記，記載時間約一年十個月，始於 1944 年（昭和 19 年）5 月 27 日到 1946 年 3 月 23 日。

對比。

一、開原綠與臺灣日記

開原綠日記寫作於二次大戰期間，現存日記本開始於 1944 年（昭和 19 年）1 月 1 日，最初一直到 2 月 22 日每日皆有紀錄，之後則零散不全。該年另有 3 月 1-5 日、3 月 25 日、4 月 4 日，共 7 篇，隔年 1945 年記載有 1 月 1-4 日、8 月 7 日、8 月 8 日（有日期但無內容），最後一篇已經是戰後，日期為 1946 年（昭和 21 年）2 月 4 日，斷斷續續記載了 1944 到 1946 年在臺灣的生活點滴。日記被發現於 2010 年 8 月開原綠過世之後，女兒整理母親遺物之時。這是一本淡藍硬紙封面的活頁筆記本，上面用鉛筆寫著「日記覺書帳」，由此可推知，此日記具有濃厚的生活紀錄色彩。戰前受中等教育以上的日人或臺人，多有書寫日記的習慣，因應而生的就是坊間也普遍販售精美的日記本。但女學校畢業的開原綠只隨意地使用一般筆記本，可見這生活紀錄的開始非常隨性。在開原綠生前，從未對家人提到過有日記的存在，因此，到底在這 67 篇日記之外，是否也有其他日記寫作，目前已不得而知。

開原綠原名近藤綠，1917 年（大正 6 年）6 月 11 日出生在廣島縣芦品(ashine)郡的新市町（2003 年併入福山市），是士族近藤又右衛門的次女，畢業於深安技藝高等女學校。

近藤家除了農業之外，亦從事機織業，生產有名的備後絣。1936 年（昭和 11 年），19 歲的近藤綠與廣島縣沼隈郡瀨戶村（現廣島縣福山市瀨戶町）的開原家長男開原誠結婚。這樁婚事是深安技藝高女的裁縫科老師片山（原姓開原）秀子所介紹。秀子老師是開原家三女，1911 年（明治 44 年）生，曾遠赴東京就讀共立女子專門學校。畢業後，回深安技藝高等女學校任教，近藤綠在畢業後回母校參加和裁講習時，被秀子老師一眼相中，決定替自己的弟弟開原誠作媒。開原家雖是一般農家，經濟不算寬裕，但長女雅子之夫在東京 高円寺經營洗衣店，經濟富裕，因此開原家的其他兄弟姊妹有了上京的機會。[9]

開原誠[10] 生於 1913 年 10 月 21 日，因為當時農村習慣

---

9 洪郁如，〈片山秀子女士訪談紀錄〉，未刊稿，2001 年 10 月 6 日，訪談地點：廣島縣福山市受訪者自宅。

10 到目前為止，開原誠自身所留下的文字紀錄，僅有〈材料廠記録〉、〈材料廠戦斗行動概要〉、〈ある手紙〉三篇文章，收錄於独自六三会，《続比島進撃の思い出》（岡山：自費出版，1974），頁 177-188、232-234。1941 年原屬於臺灣步兵第一連隊的開原誠，被編入獨立自動車第 63 大隊，赴菲律賓作戰，存活的臺日隊員在戰後組「六三會」，1974 年成員合編戰史，自費出版。〈材料廠記録〉是他以元材料廠曹長身分，和元材料廠主計伍長森山正一合撰；此文與開原誠單獨撰寫的〈材料廠戦斗行動概要〉兩篇文章，主要在敘述部隊編制與在菲律賓的作戰經過，包括天皇宣布投降之後，部隊成員對投降與否意見分歧等等。〈ある手紙〉記載自身在戰後 1946 年 11 月從菲律賓回到日本，將戰友吉田利信軍曹戰死消息，透過寫信告知戰友之妻。28 年後，吉田女兒在母親過世後的遺物中發現此信，再度與開原誠聯絡的經過與心境。這篇文章是開原誠提及家人的唯一紀錄，文中述及他與吉田在最後的戰門臨行之前，心知可能是此生最後的訣別，而將自己的愛錶和寫給家人的遺書託付吉田，結果吉田不幸戰死。

是不讓兒子受太高教育，以避免農業後繼者為求學謀職離鄉，奔向都會。因此雖身為長男，開原誠被剝奪受高等學校教育的機會，開原家女兒全都受過高等女學校以上教育，唯有兒子未能享受更高的教育投資。近藤綠的婚禮儀式沒有新郎出席，因為開原誠已經在前一年的 1935 年赴臺灣擔任警察職務。開原誠雖身為長子，卻不願繼承農業，加上與後母不和，曾一度遠赴東京到大姊夫洗衣店幫忙，為求發展又去當兩年志願兵，後參加臺灣警察考試合格，於 1935 年赴任。對於誠不肯回鄉，在外地頻頻更換職業，後母始終怨言不斷。[11] 對照開原家現存 1968 年（昭和 43 年）有廣島縣政府認印的開原誠軍隊履歷書，和 1963 年（昭和 38 年）發行的外務大臣人事課長認印的臺灣關係事項履歷證明可知，開原誠是在 1932 年 1 月以志願兵身分被編入輜重兵第五大隊第二中隊，隨即在隔年 11 月滿期退役，編入預備兵。1935 年 6 月 13 日，正式成為臺灣總督府巡查，經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結訓後，被派赴新竹州中壢郡，擔任巡查職務。

1936 年 10 月，婚禮後改姓的開原綠在公公金藏的陪同下，搭船前往臺灣，與夫君相會並再度辦理結婚。當時船整整開了兩天兩夜才抵達基隆，開原綠回憶，在下船之前，有一年輕男子上船來，與金藏相談甚久，但是金藏對開原綠並沒有任何介紹，她猜想這個人應該就是自己的夫婿。兩人度過了一段新婚期，最初居住於中壢，後來又調至楊梅、新埔，

11 洪郁如，〈開原綠女士訪談紀錄〉，未刊稿，2001 年 10 月 6 日，訪談地點：廣島縣福山市受訪者自宅。

最後在 1940 年升任高等警察時，轉居新竹市錦町三番地。

1937 年 7 月蘆溝橋事變爆發，開原誠隨即在 9 月被軍隊徵召前赴中國。新婚妻子也只好回到日本內地婆家，同住約一年多，恪盡農家長媳應盡的義務。開原誠在中國戰場的經歷大致如下：他在上海待了約兩個月之後，在大陸各地輾轉行軍，一段時期又再度返回上海，之後回到高雄。在高雄軍隊重新整編後，又被派遣至香港，參加南寧作戰（中方稱之桂南會戰，1939 年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1 日），中途因為生病吐血而返香港。1940 年，因病被遣回臺灣陸軍病院接受治療。開原綠獲知此消息，極為欣喜，隨即也在這一年趕回臺灣與丈夫相聚，一直到這場戰爭結束。開原綠居住在新竹的警察宿舍，戰爭熾烈時避難到地勢較高的竹南郡南庄。

1941 年 6 月 4 日，長女裕子在新竹誕生。日記主初為人母的喜悅持續不到幾個月，同年 12 月 2 日開原誠再度被徵召入隊，沒有告知妻子就秘密地從基隆出港。在艦上，開原誠得知了太平洋戰爭開戰消息。同時期約有 60 艘 6,000 噸級軍艦也從基隆出港，開原誠所乘之軍艦駛往菲律賓，而其他軍艦分別駛往新加坡與新幾利亞。[12] 1941 年，開原綠在丈夫出征後，和年幼的女兒兩人相依為命，繼續居住在新竹；1944 年，因戰局緊迫而再度避居南庄的某警察分室。當時開原誠入伍後的軍人薪資約 165 圓，其中 100 圓寄回給在臺灣的母女，加上原來警察 60 圓的薪水，生活算是很好過；但

12 開原誠日後推測，因為 12 月 8 日日軍攻擊珍珠港，故 2 日出港應是軍部整體計畫之一部分。洪郁如，〈開原綠女士訪談紀錄〉，未刊稿，1995 年日期不詳，訪談地點：廣島縣福山市受訪者自宅。

在物資缺乏的戰爭時期，開原綠還是經常去抓魚，採山菜來補充糧食。[13]

這本日記執筆於 1944 年，也就是丈夫再度被徵召入隊，轉赴菲律賓後的第三年，母子兩人居住在新竹的警察宿舍。

二、日常性與非日常性

日記的特徵之一，在於其書寫形式的日常性，但這裡的日常性又必須放置在戰爭的非日常性來審視。

日日緊迫的戰局將殖民地臺灣的日常帶向非日常，空襲的增加，使後方成為另一個戰場。

日常與非日常兩個磁場是相互作用的。當戰爭非日常的磁力逐漸明顯攪亂民眾的日常，日常的磁場也同時在增強抗力，試圖將瀕臨失序危機的生活拉回軌道，留住「一般」日常生活的安全感與幸福感。生活者身上出現的這種抗現實的反作用力，也在企圖力挽狂瀾。文中所顯示在「敵機」機影迫近生活圈境，空襲警報時而響起的時刻，日記主與友人們極度頻繁的互訪、觀賞電影這種狀似遊樂過度的現象，可視為在外部環境巨變下，生活者企盼挽留「日常」的極度反應所留下的軌跡。

13 洪郁如，〈開原綠女士訪談紀錄〉，未刊稿，1995 年日期不詳，訪談地點：廣島縣福山市受訪者自宅。

昭和十九年一月一日　陰天

這是丈夫出征後迎接的第三個新年。裕子也四歲了，真是感慨不已，但一味地浸潤在感傷中也不好。做了雜煮慶祝新年，也寄了封賀年卡給丈夫。在嚴肅的氣氛中迎接新年，並為東亞繁榮而祈福。下午留守部隊群聚一堂聯歡，有蛋酒可喝。首先由我彈奏一首《梅亦春》，池田獨唱《春雨》和《君之代》，大家興高采烈。不料空襲警報突然響起，大夥慌慌張張準備解散，但幸好警報很快就解除。晚上解除警戒，四五個人一起打撲克，玩歌留多紙牌，一直到十二點多才散會，真是愉快的一天。

這是開原綠臺灣日記的第一篇，整理開原綠臺灣日記有如下幾個特徵：

（一）「留守家族」頻繁的交遊與互訪

在三個月的日記中，母子家庭與外界人際往來幾乎是一日不缺。時而訪友，時而友人來訪，時而相邀出遊，或參加後方動員活動。67 篇日記之中，言及與日人友人交流者有 48 篇，可以說，除了身體不適在家休息以外，母女兩人從早到晚在家孤獨以對的日子少之又少。交流的對象都是在臺灣的日本人，特別是(1)新竹州被軍隊徵召的日本警察之家人，(2)透過參加洋裁講習會所認識的友人，另外有(3)高等女學校時代的學姊。由於日記寫作時期多在新年過後的一、二月，經常見其聚集在某個朋友家吟詩、打撲克牌、唱歌、吃飯、照相，玩到深夜才歸去，甚至留在友人家過夜。日記作者自

覺地反省：「玩過頭了」(1944.01.05)，「這樣下來配給米還有剩呢」(1944.01.20)。頻繁的人際交流，無疑是戰爭時期殖民地日人母子家庭寂寞、不安、孤單的寫照。正如上面引用新年日記中出現的「留守部隊」一詞所表現的，就是這種後方殖民地日人社會的連帶感。

（二）動員演習活動的交流凝聚機能

值得注意的是，戰時各種動員與演習等活動，也為後方日人女性外出活動提供了外部空間與正面理由。提到參加後方演習講習等活動者有 14 篇，皆見其友人同時參與，14 次的動員活動多數為婦人會奉公班[14] 的活動。具體包括有(1)學習舞蹈，再轉授奉公班員。(2)急救訓練、三角巾、繃帶包紮法與擔架使用法實習、炊事支援、防空訓練等，此類活動最多。(1944.01.23)她寫道：「指導員幽默有趣，一邊實習，一邊笑到肚子疼」，而一部分急救品袋也在家製作。(3)製作慰問袋，以班為單位，挨家挨戶訪問，簽寫激勵前線將士的卡片。(4)出席慰問演講及活動，其中至少有一次是在鄉軍人會所主辦，一次是桔梗俱樂部[15] 主辦的紙仔戲。[16] 這類以「留

[14] 此婦人奉公班隸屬於何種動員體系，由於日記中沒有進一步線索，目前無法查證。在 1995 年的訪談中，開原綠在回答關於愛國婦人會的詢問時表示，她知道愛國婦人會之存在，但自己並非會員，也未曾參加該會活動。

[15] 「桔梗俱樂部」1941 年 7 月成立於臺北，後逐漸擴充到全臺，是皇民奉公會的外圍團體，參與的成員包括臺灣人與日本人未婚女性。蔡錦堂編著，國立編譯館主編，《戰爭體制下的台灣》（臺北：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頁 92。

[16] 日文原文為「紙芝居」，臺語叫做「紙仔戲」，感謝匿名審查人指點

守家族」為對象的慰勞活動，的確達到一定效果。日記主寫道：「話語溫馨，感激不盡」。(5)輪流擔任購買配給品的工作，配給票發下來後，各個輪值者代表去街上購買。

戰爭動員研究，多從國家⁄統治當局觀點，著眼於女性動員在國民統合上的意義。一方面原先以男性為構成分子的近代國民國家，由於戰爭的現實需要，填補戰爭徵調男性所產生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以往被排除於外的女性，開始被積極編入國家各式組織中。而女性也利用此時機掙脫傳統性別規範，企圖達成自我實現與社會地位的提升。就殖民地戰爭日記文本觀之，此一現象功能確實存在，但就殖民地日人社會而言，同時具有增加以女性為主體的交流頻率、提高社群凝聚力與機動性之功能。在殖民地遭遇戰爭下孤寂的日人「留守家族」，因此獲得極多官方認可提供的通外管道。[17]

（三）作為戰時娛樂與自我投影的電影觀賞

戰爭時期電影主要的兩個意義：一在宣傳動員，二在戰時娛樂。這些以戰爭為敘事背景的電影，與戰時觀眾的實際生活相去不遠，因此也容易引起共鳴。對家族中丈夫或兄弟被徵召在前線作戰，包括日記作者在內的後方觀眾而言，具有一定的慰藉與鼓舞作用。[18] 日治時期新竹市內電影院有三

臺語說法。

17 關於臺灣總督府是否有政策規劃，來安頓留守家族的問題，一般而言，愛國婦人會與日後的大日本婦人會等各式婦女團體被當局期待擔負此任，至於相關的政令沿革，則待另文加以考證。

18 此時期在電影放映前，日本當局會先播放所謂「新聞影片」（ニュース映画），對戰爭時局進行報導，做為內外地人民與戰地軍人、國家

家，分別是「新竹座」、「有樂館」與「世界館」，其中建於 1933 年（昭和 8 年），為全臺首座有冷氣、地毯之新式高級劇場的「有樂館」，是唯一具體出現在開原綠日記中的電影院名。

頻繁的娛樂活動，是一種排解寂寞的方式。我們發現，電影與小說是日記作者在戰時殖民地生活重要的日常娛樂之一。就電影而言，在短短三個月多的日記中，日記作者觀賞電影十次，其中列舉的片名有：《富士に立つ影》、《海軍》、《愛機　南へ飛ぶ》、《釣鐘草》、《無法松の一生》、《決戦 の大空》、《秘めたる 覚悟 》。在計畫觀賞電影《海軍》之際，還同時向友人借原著小說閱讀。1 月 26 日第一次前往電影院時，因客滿敗興而歸，一直到 2 月 1 日才如願觀賞該片。

開原綠在新竹所觀賞的電影內容大致可整理如下。

(1)《富士に立つ影》〔觀賞日：1944 年（昭和 19 年）1 月 23 日〕

1942 年（昭和 17 年）京都大映製作，導演池田富保·白井 戦 太郎，[19] 阪東妻三郎主演。原作為 1924-1927 年白井喬二連載於《報知新聞》的長篇小說。內容為幕府末年德川家第十一代將軍家齊計畫在富士山麓築城，以為練兵與研究軍事策略之用。當時有築城學兩大山王之稱的佐藤菊太郎和熊木伯典兩人，為了獲得築城軍師的地位而對立，是一部描述為追求正義與和平而戰的「時代劇」（以明治維新以前

之間的重要聯繫，但開原綠日記中並沒有特別提及。

[19] 戰後另有 1957 年佐佐木康導演重新拍攝的東映版本。

日本史為題材的歷史劇)。片中的戰鬥特技動作、發射煙火、群眾動員等大場面，在當時極具震撼性與娛樂效果。[20]

(2)《海軍》〔觀賞日：1944 年（昭和 19 年）2 月 1 日〕

原作乃是 1942 年 7-12 月岩田豐雄連載於《朝日新聞》（獅子文六）的同名小說，電影版最初於 1943 年（昭和 18 年）由松竹製作，導演為 田坂 具隆。[21] 內容描述海軍軍人谷真人的一生，從他的家世生平到求學生涯，在好友牟田口隆夫的慫恿下，報考海軍兵學校並通過重重難關而合格入學。後來接受嚴格訓練，成為一「帝國海軍軍人」，並被選拔執行特殊潛航艇攻擊珍珠港的任務，被奉為所謂九軍神之一；片中也描述了男主角與好友牟田口之妹エダ的戀情。此片是當時海軍報道部企劃的大東亞戰爭二周年紀念電影，並且是海軍省後援、情報局選定的「國民映畫」。[22]

(3)《愛機　南へ飛ぶ》〔觀賞日：1944 年（昭和 19 年）2 月 6 日〕

1943 年（昭和 18 年）松竹（大船製片廠）製作，導演佐佐木康，是一部鼓舞觀眾提高鬥志的戰爭宣傳電影。特別是在航空戰漸趨熾烈，人員犧牲增大的時期，青少年被視為戰力補給的重要對象。如何「說服」他們的母親們，成為青少年戰爭動員的前提條件。這部電影是標準的母親類型片。劇情內容是描述女主角在丈夫戰死之後，一改原本盼子從醫

[20] 田中純一郎，《日本映画発達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65），頁 101。

[21] 戰後另有 1963 年村山新二導演重新拍攝的東映版本。

[22] 田中純一郎，《日本映画発達史》，頁 141。

的心願，轉將獨子送入陸軍航空學校就讀。本片描述年輕空軍飛行員與母親之間的親子之情，主題曲曾紅極一時。[23]

(4)《釣鐘草》〔觀賞日：1944 年（昭和 19 年）2 月 9 日〕

1940 年（昭和 15 年）東寶製作，改編自吉屋信子暢銷小說《花物語》的其中一篇，石田民三導演，高峰秀子主演，內容敘述父母雙亡後投靠伯父家的一對姊弟的手足之情。[24]

(5)《無法松の一生》〔觀賞日：1944 年（昭和 19 年）2 月 21 日〕

改編自岩下俊作連載於《九州文學》的小說《富島松五郎傳》。1943 年（昭和 18 年）大映京都製作，稻垣浩導演，阪東妻三郎主演。內容敘述福岡小倉的人力車伕，俗稱無法松的富島松五郎，與好友陸軍大尉吉岡一家的故事。吉岡大尉過世後，無法松負起照顧其孤兒敏雄與寡婦良子的道義責任，無怨無悔地奉獻。從小尊敬無法松的敏雄，長大進入青春反抗期後，意識到與無法松的社會階層歧異而有意疏離，但良子對無法松始終抱持謝意。此片描述了其間的離合悲歡，但原片中無法松直接對良子吐露思慕之情的 10 分鐘片段，在當時內務省檢閱中遭剪除，理由是戰爭寡婦在後方的戀情，可能影響前線軍隊的士氣。[25]

(6)《決戦の大空》〔觀賞日：1944 年（昭和 19 年）年 3 月 2 日〕

---

23 田中純一郎，《日本映画発達史》，頁 139。

24 一般社團法人日本映畫製作者連盟（映連）資料庫：http://db.eiren.org/contents/02019400042.html（2014 年 10 月 22 日檢索。）

25 田中純一郎，《日本映画発達史》，頁 140。

1943 年（昭和 18 年）東寶製作，原節子主演，海軍省後援，此片被指定為「情報局國民映畫」。故事舞臺的松村家，是土浦海軍航空隊的預科練飛生周末休假寄宿地，電影描述了松村家大女兒杉枝和年幼弟妹三人和這些來訪的練飛生交流的溫馨景象。體弱的弟弟憧憬航空隊學校訓練生活，一心期待弟弟身強體健的杉枝帶領弟妹到航空隊見學，果然百聞不如一見，訓練嚴格但精神充實，教官充滿慈愛之情。弟弟決意報考，後順利合格入隊，杉枝大喜。此片顯然是為吸引更多青少年從軍所拍攝的宣導影片，意在補充戰爭大量消耗的兵力。[26]

(7)《秘めたる 覚悟 》〔觀賞日：1944 年（昭和 19 年）3 月 4 日〕

1943 年（昭和 18 年）東寶製作，滝沢 英輔導演，長谷川一夫、山田五十鈴主演。內容描述銀座洋食屋店主女兒おしず，由於母親過世，她幫助父親實際擔負起餐廳經營的責任。妹妹論及婚嫁之際，父親開始擔心おしず的未來，她雖傾慕於青梅竹馬的文雄，在考慮家裡事務之下，仍將之埋藏心底。這部描繪日常生活的影片中，不論是女主角為節約食材所精心設計的代用餐，或是登場人物的穿著打扮，無一不呈現戰時色彩，充滿企圖以潛移默化方式，引導民眾配合時局「共赴國難」的意涵。[27]

另外，閱讀小說雜誌也是女兒白日在外遊玩或夜深人靜

---

[26] 田中純一郎，《日本映画発達史》，頁 139。
[27] 田中純一郎，《日本映画発達史》，頁 141。

入睡後，日記主孤獨一人時的消遣之一。就小說而言，除了上述岩田豐雄的電影原著小說《海軍》(1944.1.26)之外，兩個多月中她還閱讀有《男》[28] (1944.1.28)、《銀座八丁》[29] (1944.1.31)、雜誌《婦人俱樂部》(1944.3.4)等。總而言之，電影與小說，一方面發揮後方慰藉孤寂的效用，另一方面，戰爭題材的娛樂，發揮潛移默化的機能，促使在心理上接受戰爭日常化。

（四）裁縫與自我實踐

裁縫是開原綠戰時生活中重要的一部份，有裁縫記載的日記共 28 篇。她在深安高等技藝女學校時代，曾上過裁縫課，習得初步技能；畢業後，自己繼續學習和裁。至於洋裁，則是到臺灣之後才正式學習。我們可以看到和服多手縫，洋服則多使用縫紉機。日記主家中似置有縫紉機，因為她曾提到，「因為縫紉機用的黑色縫衣線用完，今天無事可做」(1944.02.15)。第一篇提到工資是白襯衫 1.5 圓，衣服一件 2 圓，而 1944 年當時開原誠的警察月薪為 60 圓。「賃仕事」也就是家庭副業收入。由於工作地點在家中，可以利用看顧小孩和家事之餘來工作，時間彈性大。拜託她裁縫的皆是生活圈中的親朋好友，裁縫內容有補修大人、小孩衣物、縫製

[28] 羽様荷香，《男》（大阪：樋口隆文館，1914）。此小說目前日本國會圖書館收藏有後編與終編，但也不完整，故在此暫省略內容介紹。

[29] 武田麟太郎，《銀座八丁》（東京：改造社，1935）。內容以軍國主義初始之際的銀座為舞台，描寫酒吧女店主、女侍、新聞記者、官僚資產家等市井男女，在事業、政治與愛欲之間的頹廢生活。

洋式襯衫、外套、和服長內衣、短外衣、和式女長褲モンペ等，她也為自己和女兒縫製各式日常所需衣物，自己也染布燙衣。戰爭末期物資缺乏的情況也反映在日記有關裁縫的記述中，一是受託的衣物修補多於新製，一是布料的重複使用。比如女長褲モンペ的布料，就是來自自己的和服(1944.01.28)，她也把自己和服短外衣裡襯的上等布料，拆下來製成女兒的新衣(1944.02.03)，洋外套的襯裡使用了大姑秀子送的披肩(1944.02.05)。另外又述及當時作為布料取代品的人造纖維[30] 縫製困難的缺點，最後她也提及因不滿意自己手藝而少收對方費用(1944.01.29-31)。

對開原綠而言，裁縫工資是做為零用錢的現金收入，但更重要的在於從事「工作」的心理意義。她羨慕友人池內能出去上班，但另一方面，自己即使在家，也同樣在工作賺錢，裁縫帶來自我肯定的充實感，發揮平衡心理之作用。「池內明天開始出去上班，好羨慕。心想如果自己也是單身一個人該多好，不過被孩子叫『媽媽』的身分比較好也說不定。」(1944.02.02)「池內今天開始出去上班，我怎能再這樣發呆下去，迅速把家事做完，要開始著手家庭副業了。」(1944.02.03)

戰前開原綠在臺灣習得的裁縫技術與經驗，在戰後回到日本內地發揮了經濟效用。許多街坊鄰居或親朋好友都拜託她縫製衣物，因此又重新開始這項家庭副業。女兒裕子表

---

30 日記原文為「人絹」，當時又稱為「ステープルファイバー(staple fibre)」，或簡稱「スフ」，由於易破又不耐用，在臺灣民間成為粗濫製品的代名詞。蔡錦堂編著；國立編譯館主編，《戰爭體制下的台灣》，頁 157-158。

示，戰後初期日本物資缺乏、又無廉價成衣的時代，由於母親的裁縫工夫，使得她和戰後出生的妹妹都能穿著漂亮衣裳。在殖民地累積的家庭裁縫副業經驗，顯然具有戰爭前後的聯貫性。在歸國與公婆同居以及戰後丈夫歸來創業之際，開原綠以家庭為生活據點，持續裁縫副業，具有自我實現的心理意義。

三、日記的空白

開原綠日記記載斷續而不完整，在 1944 年連續記錄兩個多月的日記之後，3 月中旬到 1945 新年之間，除了 3 月 25 日到臺北祭拜戰死友人並順道到基隆訪友，以及 4 月 4 日記述月事來潮又逢感冒身體不適之外，將近九個月沒有日記紀錄。當然與個人性格習慣有關，但在家庭狀況無變動之下，推測很大因素是時局緊張，導致無餘裕可繼續。1945 年新年重新開始的日記記述方式，明顯比前年簡短，從字裡行間可窺知空襲頻繁與逃難疏散的情景。該年日記簡短字句中，充滿了倉促緊迫的氣氛。

1943 年 11 月，美軍首次轟炸新竹機場，1944 年 10 月之後，如同島內各大都市一樣，新竹屢遭空襲。最慘烈是在 1945 年 5 月，以火車站為中心的市區遭受綿密轟炸，市民死傷慘重。據研究指出，由於日本在新竹設有海軍飛行基地等重要軍事設施，二次大戰期間美軍在臺灣全島的落彈量，以

新竹居冠。[31] 1943 年 11 月，新竹飛行基地遭轟炸後，當時居住竹北到新竹通勤的吳濁流感覺身家危險，趕緊又疏散到新埔。[32] 但屬於警察系統日人「留守家族」的開原綠，在臺無親無故，必定等待組織性的疏散計畫實施，才可能搬離新竹市。1944 年 1-3 月的日記顯示，日記主住家在徒步可達新竹市街區的距離，街區友人亦不時來訪，看電影、參與後方動員等活動地點亦在市區，因此可推測此時尚未疏散至山間。疏散到南庄的時期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是在日記留白的 1944 年 3 月到 12 月之間，第二個可能是在 1945 年 1 月 5 日之後，因為 1 月 1-4 日還記載了新年的神社參拜人潮、庭院的黃色菊花，並且若無其事般地，同一年前的新年一樣，到池內家聚餐玩牌。

> 一月一日　四點起床。與池內、廣中一起去神社參拜。給先生和中隊長寫明信片。下午大家帶食物到池內家，享用豐盛的一餐。晚上通宵打撲克牌，一點半就寢。
>
> 一月二日　幫忙準備伙食款待將士們。晚飯又在池內家吃了豐盛一餐。夜裡玩花札（日本傳統紙牌遊戲），又是半夜一點後才就寢。
>
> 一月三日　七點半發布空襲警報。敵機來襲。躲入防空壕。午後三點改警戒警報。
>
> 一月四日　發布空襲警報。敵機來襲。

1943 年 11 月到戰爭結束這段期間新竹空襲狀況，我們可

31　鍾堅，《台灣航空決戰》（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頁 270-271。

32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頁 142-143。

以用《台灣航空決戰》的年表配合當時任教於新埔國民學校的杜潘芳格的日記紀錄來重現，並掌握開原綠日記空白背後的實際情境（附表 1）。1944 年以後，過密的空襲帶來焦慮與緊張，默默從事教學的杜潘芳格述及：「空襲總在入夢之際來臨」(1944.06.21)，甚至夜裡也會夢到空襲(1944.09.22)。11 月 10 日上午空襲警報，指導來上學的兒童們折返家中。數日後又寫道：「警戒警報發布。這陣子來襲頻繁，彷彿生命的終點已在眼前」(1944.11.17)。1945 年初，轉變到「確實，空襲已經時常發生」(1945.01.15)。數日後具體描述如下，「今天也有波音（戰鬥機）通過。飛快躲入警察分室防空壕的心情，很怪」(1945.01.18)，「身心都切實感受到時勢的緊迫」(1945.02.27)。進入 1945 年以後，杜潘芳格的日記記載次數也明顯減少，時或出現一個月一、二篇的斷續狀態。「空襲警報、警戒警報，共兩回，並遭轟炸」(1945.04.03)。然而，在警報與轟炸聲中，她同樣也執著地寫下對男友的情感，對學校兒童們的責任感，以及自我人生的苦惱。[33]

在漫長空白之後，開原綠日記在日治時期的最後一篇，記錄了 1945 年（昭和 20 年）8 月 7 日從南庄再度往山區疏散的情景。

> 聽了南庄庄長的一席話，說道今天起出發開始新的生活，要懷抱希望，將會盡力幫助大家。整理家當忙碌

33 以上參閱杜潘芳格著，下村作次郎編，《フォルモサ少女の日記》。誠然，對開原綠與杜潘芳格兩名日、臺女性的日記作比較研究，是極有意義的課題，但因本論文設定以開原綠日記為主軸來展開分析，故在杜潘芳格日記的使用上，主要僅限於補白而不在比較。

不已，好不容易把行李託付到可寄存之處，又把要運往山裡的行李搬出來，一直到中午過後才就緒。午後突然轉陰，雨勢不甚大，所以按原定計畫在午後四點出發。我們母女倆人和山崎他們一起向山裡出發，暫時告別南庄。五點多抵達，把行李排放一個房間裡，隨便吃個晚飯，便早早就寢。由於四五天來疲勞累積，立即沉沉入睡。

一周後，母子在山間與其他日人一起迎接終戰的來臨。半年後的 1946 年 2 月 4 日，即將啟程返回日本的開原緑，寫下了在臺灣最後一篇日記。

多少歲月流逝　常綠之島
寂寞出航　今朝此時
春雨濕透　○○○○　漂浪旅人

日記文字與留白，同樣都呈現著戰爭時期日常與非日常之間的緊張關係。隨著戰局演變與日方敗退，沉重陰鬱的非日常逼近並對日常與生命造成威脅。戰爭結束後，這本日記隨著日記主踏上歸鄉之途，收藏在衣箱深處，直到半世紀後的 2010 年，日記主去世，長女裕子重新翻開這本殖民地戰爭日記的第一頁。

四、孤寂何不歸鄉里：性別、帝國、殖民地的重層關係

討論近代日本的社會階層移動，無法跳過帝國與殖民地之間密切的關聯性。戰前期待社會地位提升的日本青年，許

多選擇至殖民地就職。殖民地統治體系提供大量職缺，其中主要包括各級行政、教育、警察等系統。這些外地職位，也是亟欲脫離農民處境的日本青年夢寐以求的白領工作。日記主的婚姻對象，就是其中一員。同樣地，青年女性理想的「立身出世」之一，就是成為一近代「主婦」，居住城市新型住宅、成立以夫婦兒女兩代為成員的小家庭，或而僱用女傭從事家務勞動。主婦則活用女學校所學知識，管理丈夫薪資所得與主持家務，並營造有文化嗜好的高格調家庭。帝國最初的殖民地臺灣，很快提供近代日本青年男女一個圓夢的新天地。

開原綠在戰後曾表示，自己會選擇一個人嫁到無親無故的殖民地臺灣去，是因為不用跟公婆、大家族同居，也不想從事婆家平凡的農業。在臺灣先生待遇好，警察太太生活自由悠閒，可以做些自己想做的事。1941 年 12 月丈夫被徵召，到 1943 年 3 月 19 日高千穗丸在基隆外海被美軍魚雷擊沉之前，並不是沒有返回廣島縣福山市的機會。但是考慮到臺灣生活較為自由自在，所以還是決定繼續留在臺灣等待丈夫。一直到 1943 年高千穗丸悲劇發生，臺日航路轉危，1944 年後臺灣島內也開始因空襲而生命安全備受威脅，但此時已經毫無選擇餘地了。她又以事後觀點補充指出，當時即使回內地，情況也不會比較安全理想。[34]

以女性為主軸的家庭生活運作模式，須有兩個基本條件。第一，殖民地日人家庭許多為核心家庭，正如開原綠選

[34] 洪郁如，〈開原綠女士訪談紀錄〉，未刊稿，2001 年 10 月 6 日，訪談地點：廣島縣福山市受訪者自宅。

擇臺灣生活的意識層面，很大部分是意圖避免與公婆同居。在臺日人社群之間，由父母子女形成的小家庭占多數。因此，在殖民地為人妻，傳統的「媳職」往往受到豁免，只要扮演「妻職」或加上「母職」即可。無公婆同居的條件下獲得了較大的活動空間。第二，日本男性被徵兵離家之後，「妻職」又因男主人不在，而獲得實質輕減，即所謂「主婦」不必以男主人為軸心運作。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日記主與其女性友人們，毫無拘束地集會或而互訪，晚歸或而過夜，閱讀小說、頻繁看電影，包括書寫日記。女性之所以能夠擁有這些「自己的時間」，無非是「殖民地」「戰爭」時期的特殊環境條件下，「妻」、「媳」等主婦傳統規範獲得某種程度鬆綁的結果。[35]

然而，殖民地在迫使提供殖民母國青年這些職位與資源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勢必以各種形式牽動或制約了臺灣青年的階層移動、家族形態、性別規範問題的發展走向。女性與青年確立主體性的問題，在帝國領域裡間接轉嫁至殖民地。這個問題無論在日本社會史研究或女性史研究領域，都尚有議論思考之餘地和必要性。

---

35 2012 年口頭報告時，評論人質疑日記主在戰時頻繁地訪友與遊樂，可能是戰爭時期以前生活型態的持續。筆者的答覆是，關鍵是男性家長不在，「確保」了女性在生活安排的自由度。之所以容許其頻繁地夜不歸家、盡情享受電影與小說、或攜幼女外遊，與其說是戰爭的因素，不如說主要是因男性家長不在家。最明顯就是這本斷續不全的日記書寫，視其日期記載，皆是男主人從軍在外的時期。當然這些戰爭時期的電影小說等娛樂、婦女活動，具有濃厚「愛國」或後方動員色彩，才讓女性的家庭外活動成為可能。

結語：日本民眾的「帝國之後」

有關在臺日人的文字紀錄應該如何評價的問題，看似容易，其實複雜。所謂容易是指結構上的問題，因為書寫者在「彼時」身居殖民統治支配者的權力位置，「此時」研究者在對其文本進行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主義批判，往往具備某種「必然性」與倫理「正確性」。但是這正也是複雜之處，換句話說，研究者的歷史評價被視為「答案」是先驗而可預期的。觀察 21 世紀後的日本保守言論界可知，理性上即使不否定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主義之「惡」，卻往往在情感面上對此歷史批判產生反射性的排斥反應。

這是一本沒有臺灣人登場的臺灣日記，許多在臺日人文學寫作所呈現的一個共同特徵，就是所謂「隔著車窗看臺灣」，而開原綠的臺灣日記，甚至連這種「觀看」的痕跡都很難識別。這一方面可能是源自日記寫作本身的特徵，也就是所謂內省與自我內心表現的特殊性；但另一方面，殖民地統治階層的社會位置，也相當程度導致作者對臺灣人社會「視而不見」。以作者開原綠的「位置」來說，居住於警察宿舍，在丈夫出征後和年幼女兒過著相依為命的生活，更強化了這個戰爭中的單親家庭和其他類似的日本人家庭之間的聯繫與互動。反過來說，這個母子家庭居處於在臺日本人社群中，自給自足，感受不到和臺灣人社會之間接觸的必要，自然缺乏所謂殖民地的想像。日人與臺灣社會的關連度，與殖民社群中的身分職業與世代差異有關。與臺灣人同窗受教育或從事職務的在臺日人，以及第二代的所謂「灣

生」，即使與臺灣人菁英階層之間存在複雜的愛恨情結，但其「臺灣意識」顯然較具現實感。

相對於日記文本中呈現的社群隔離性，日記之外，配合有關開原家其他資料與訪談，卻可發現「臺灣」的痕跡以其他形式出現在日記主家族的戰後生活。其一，家事與烹飪中的殖民地記憶。炒米粉是開原綠一生的拿手好菜，不但有女兒裕子接棒，也成為開原家族中沒有殖民地經驗的戰後世代極為熟悉的家常菜。家事方面，開原綠曾得意地敘述自己在臺灣習得擰斷雞頭的宰雞功夫，戰後回到日本內地，婆婆與妯娌等都看得目瞪口呆。其二，少數的臺語字彙記憶，比如「面桶」等。[36] 其三，「戰友」與戰後省思。開原誠在菲律賓與臺灣人部下生死與共的戰友情誼，在戰後繼續以通信與家族訪問方式延續，直至 1994 年開原誠過世。戰爭記憶，凝聚了戰後日臺「戰友」間的情誼，[37] 因帝國權力位階的解消，雙方的交流重新以對等形式展開。對於日臺差別待遇等

---

36 開原綠學習臺語字彙的管道，甚至是新竹米粉料理法，很可能是來自臺灣女幫傭。生前她曾提到，在 1941 年 6 月長女出生後，曾請一位公學校畢業的臺灣女孩幫助家務，到產後身體恢復為止，時間並不長。另外日常生活物品的採購，多少有與臺灣人接觸的機會，除此之外並不多。她曾告訴筆者，當時自己並沒有臺灣人朋友，戰爭時期與戰後有接觸的幾位臺人，是丈夫開原誠軍中的部下。因此嚴格說來，並不是與臺灣人毫無接觸。洪郁如，〈開原綠女士訪談紀錄〉，未刊稿，2002 年 10 月 15 日，訪談地點：廣島縣福山市受訪者自宅。

37 上面曾提到開原誠所屬的獨立自動車第 63 大隊，戰後組「六三會」。1971 年日隊員重訪臺灣，1974 年成員合編戰史自費出版。独自六三会，《続比島進撃の思い出》。一直到 1990 年代，臺日的昔日戰友與彼此家族之間仍有聯繫與交流，到近年才因成員本人幾乎全數凋零，子女世代也逐漸高齡化而式微。

敏感問題，臺人戰友直言不諱的態度，讓戰後開原家族成員留下深刻印象。[38] 開原綠在晚年曾有趣地自問：「真想不通，當時在臺灣待了那麼久，怎麼沒想到要學臺灣話？」受戰後教育的女兒裕子立即回應：「你們那個時候日本人去臺灣統治人家，當然不會想到要學啦！」[39] 臺日兩地戰爭記憶與殖民地經驗在世代間的承繼與對話，尚有待後續研究。[40]

1945 年之後，國民政府播遷來臺，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社會，開始在新的環境變遷下摸索自身「去殖民主義」的艱辛道路。相對於此，日本社會，特別是具有殖民地經驗的日本民眾，在遣返回到母國社會後，面對「去帝國（脫帝國）」（而不僅只是「去戰爭（脫戰爭）」）的現實，歷經數世代，如何調適的過程，依然是「戰後」研究的未完課題。

38 參考臺灣戰友江文庭先生致開原誠的個人書信(1991.12.14)。

39 裕子女士對於公開母親日記一事，雖表贊成，但因日記中呈現了戰前日人在臺灣生活優裕的情形，而感到有些猶豫。

40 面對父執輩的戰爭記憶與殖民地體驗，戰後日本歷史學者的思維與實踐，可參閱吉田裕，《兵士たちの戦後史》（東京：岩波書店，2011）。有關在臺日人世代間殖民地記憶，以及從臺灣社會主體脈絡如何閱讀「灣生」記憶的問題，筆者有另稿述及。〈灣生記憶如何閱讀：我們準備好了嗎？〉，收入鈴木怜子，《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臺灣鄉愁》（臺北：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9-22。

附表 1　1943-1945 新竹空襲與杜潘芳格日記對照年表

年	月　日	《台灣航空決戰》	杜潘芳格日記
1943	11 月 3 日	美機飛臨竹苗地區偵照。	
	11 月 24 日	美機飛臨竹苗地區偵照。	
	11 月 25 日	中、美混編機隊掠襲新竹飛行基地，造成日海軍新竹空軍重大損害。	
	12 月 23 日	我（中華民國）空軍在新竹外海炸沉日海軍巡防艦南洋號。	
1944	6 月 21 日		空襲總在入夢之際來臨。
	6 月 27 日		兩點要開會時警報響起。奔跑。搭上了。
	9 月 7 日		昨晚十二點左右有空襲，明月高空，藍白世界。聽到或遠或近的轟炸聲時，最近好幾次都不禁對遙遠的星星投以羨慕的眼光，星星冷眼俯視著在這個可嘆又不可信的世間，還要為生存而掙扎的人們。
	9 月 13 日	臺灣總督府成立各州廳戰場行政本部，以有效解決民防疏散問題。	
	9 月 22 日		昨晚因強風而倖免被警報所驚，一覺到天明。但不愧是夢裡的空襲，實在嚇人。
	10 月 10 日	美航母特遣艦隊首度進襲沖繩，豐田司令長官於新竹發布捷號作戰警戒令。	
	10 月 12 日	美航母特遣艦隊進襲臺灣，美、日雙方展開連續五天第一階段的臺灣空戰。美機大舉轟炸全島各地。	

年	月　日	《台灣航空決戰》	杜潘芳格日記
1944	10 月 13 日	美航母特遣艦隊空襲臺灣全島各地，其中基隆、金瓜石、桃園、新竹、竹南、花蓮及水力發電廠多處受損。	
	10 月 14 日	美航母特遣艦隊再襲臺灣全島各地。美日雙方在臺灣空域激烈交戰。	
	11 月 10 日		因上午發布警報，所以讓上學的兒童們返家。
	11 月 17 日		警戒警報發布。這陣子來襲頻繁，彷彿生命的終點已在眼前。
1945	1 月 3 日	美航母特遣艦隊再度襲臺全島各地，其中新竹、花蓮受損嚴重，展開第二階段臺灣空戰。	
	1 月 4 日	駐沖繩日陸軍第九師團由師團長原守中將率領增防新竹。美航母艦載機雲上盲炸臺灣。	
	1 月 9 日	美航母特遣艦隊再襲臺灣全島各地。	
	1 月 15 日	美 B-29 戰略轟炸機轟炸新竹。	確實，空襲已經常時發生
	1 月 17 日	美 B-29 戰略轟炸機再炸新竹。	
	1 月 18 日		今天也有波音通過。飛快躲入警察分室防空壕的心情，很怪。
	1 月 21 日	美航母特遣艦隊攻擊臺灣全島，其中基隆、新竹、花蓮、馬公、臺南及高雄受損頗大。	
	1 月 22 日	駐菲美第五航空軍首度於白晝派出大批飛機炸射新竹及屏東飛行基地。夜襲高雄地區，對臺展開連續兩百天之濫炸。	
	2 月 14 日	美機夜炸新竹、臺中、臺南及高雄。	

年	月　日	《台灣航空決戰》	杜潘芳格日記
1945	2 月 27 日	美機轟炸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及臺東，其中高雄港受損嚴重。	身心都切實感受到時勢的緊迫。
	2 月 28 日	多批美機轟炸基隆、臺北、新竹、臺中及高雄市區。	
	3 月 3 日	美機轟炸基隆港及新竹、嘉義、臺南、鳳山市區和飛行基地。	
	3 月 16 日	大批美機濫炸臺灣全島各地，其中臺北市區受損頗大。	
	3 月 17 日	大批美機轟炸新竹、豐原、臺中及臺南飛行基地，臺南及新竹市區受損嚴重。	
	3 月 27 日	美機炸射新竹、豐原、臺中及臺南飛行基地。	
	3 月 30 日	美機大舉轟炸臺北、新竹、臺中市區及月眉、田尾糖廠。	
	4 月 3 日		空襲警報、警戒警報，共兩回，並遭轟炸。
	4 月 15 日	大批美機對新竹、新社及新營飛行基地進行波形轟炸。	
	4 月 17 日	大批美機飽和轟炸新竹、豐原、臺中、大度及臺東飛行基地。	
	4 月 19 日	美機飽和轟炸新竹市區及飛行基地。	
	4 月 23 日	美機分批炸射臺北、新竹、屏東、花蓮、臺東飛行基地及岸內糖廠。	
	5 月 12 日	美機轟炸新竹、臺東及新港。	
	5 月 13 日	美機又炸新竹、淡水市鎮及苗栗糖廠。	

年	月　日	《台灣航空決戰》	杜潘芳格日記
1945	5 月 15 日	近百架美機飽和轟炸新竹市區，市民損失慘重。	
	5 月 16 日	美機大舉轟炸新竹、臺中、臺南、宜蘭、花蓮及玉里市鎮及飛行基地。	
	5 月 18 日	近百架美機波形轟炸臺北、新竹、臺中、高雄、宜蘭、花蓮市區及機場。	
	5 月 19 日	百餘架美機飽和轟炸基隆、臺北、新竹、宜蘭及花蓮市區，其中基隆港受損最為嚴重。	
	6 月 16 日		空襲頻繁，災情相當嚴重。
	6 月 18 日	美機大舉空襲基隆、臺北、新竹、臺中、臺南市區及飛行基地。	
	6 月 20 日	美機空襲新竹及花蓮飛行基地，市區慘受波及。	
	6 月 21 日	美機空襲臺北、新竹、臺中及臺南飛行基地。	
	6 月 27 日	美機轟炸新竹、臺中、臺南、花蓮及臺東市區。	
	6 月 29 日	美機集中轟炸新竹市區及飛行基地，並對全島實施低空偵照。	
	7 月 5 日	美機集中轟炸新竹市區及飛行基地。	
	7 月 19 日	美機大肆轟炸臺北、新竹市區及飛行基地。	

資料來源：鍾堅，《台灣航空決戰》；杜潘芳格著，下村作次郎編，《フォルモサ少女の日記》。

徵引書目

一、專書

小野賢二、藤原彰、本多勝一編，《南京大虐殺を記録した皇軍兵士たち：第十三師団山田支隊兵士の陣中日記》。東京：大月書店，1996。

田中純一郎，《日本映画発達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65。

吉田裕，《兵士たちの戦後史》。東京：岩波書店，2011。

羽様荷香，《男》。大阪：樋口隆文館，1914。

西川祐子，《日記をつづるということ——国民教育装置とその逸脱》。東京：吉川弘文館，2009。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

杜潘芳格著，下村作次郎編，《フォルモサ少女の日記》。東京：総和社，2000。

武田麟太郎，《銀座八丁》。東京：改造社，1935。

近藤正己、北村嘉恵、駒込武編，《内海忠司日記 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2。

茂沢祐作，《ある歩兵の日露戦争従軍日記》。東京：草思社，2005。

荻島靜夫著，袁定基等譯，《荻島靜夫日記：一本遺落在中國的日兵戰地實錄》。臺北：立緒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5。

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

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
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臺北：行人出版社，2006。
蔡錦堂編著；國立編譯館主編，《戰爭體制下的台灣》。臺北：日創社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2006。
鍾堅，《台灣航空決戰》。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
藤井忠俊，《兵たちの戦争：手紙·日記·体験記を読み解く》。東京：朝日新聞社，2000。
塩澤亮繪著，張良澤翻譯，《從臺中雙冬疏散學校到內地復員：一位臺北女子師範學校教授在戰爭末期的紀錄》。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
榊原政春，《一中尉の東南アジア軍政日記》。東京：草思社，1998。
独自六三会，《続比島進撃の思い出》。岡山：自費出版，1974。

二、論文

洪郁如，〈灣生記憶如何閱讀：我們準備好了嗎？〉，收入鈴木怜子，《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台灣鄉愁》。臺北：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9-22。

三、訪談資料

洪郁如，〈片山秀子女士訪談紀錄〉，未刊稿，2001 年 10 月 6 日，訪談地點：廣島縣福山市受訪者自宅。
洪郁如，〈開原綠女士訪談紀錄〉，未刊稿，2001 年 10 月 6 日，訪談地點：廣島縣福山市受訪者自宅。
洪郁如，〈開原綠女士訪談紀錄〉，未刊稿，2002 年 10 月 15 日，

訪談地點：廣島縣福山市受訪者自宅。
洪郁如，〈開原綠女士訪談紀錄〉，未刊稿，1995 年日期不詳，訪談地點：廣島縣福山市受訪者自宅。

四、資料庫

一般社團法人日本映畫製作者連盟(映連)資料庫：http://db.eiren.org/。

War Memories and Colonial Experiences: The Taiwan Diary of Midori Kaihara

Yu-ru Hung*

Abstract

Diaries kept during wartime employ an everyday, casual style to describe extraordinary ev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y narrate everyday life under a non-everyday situation. How, then, can we understand the heavy burdens of the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und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nd wartime mobilization, which will be found in the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ordinariness and non-ordinariness in the wartime diary?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 Japanese woman's diary from 1944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a critique from the viewpoint of Japanese imperial history and colonial rule. How the writer of the diary recalls the war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normally depends on her structural "position", such as gender,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generation. First, in regard to gender, how should we evaluate diaries written by Japanese women at home which, in contrast to

* Professor of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Japan.

those written by men on the battlefield and including much information about the war, tend to focus on daily events rather than war itself? Second, from the view of political orientation, what is an appropriate attitude for a student of Taiwanese social history when handling the personal narratives of Japanese imperial rule that were written at home in Taiwan under the colonial rule of Japan? Third, from the view of generation, how should family members approach the diary, or the students of family history interrelate or combine the memory of war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found within it? How should we understand and relocate ourselves between family records and so-called "historical materials," as well as between politic situations and generations? Through the intricate relations between the diary and surrounding conditions, the writer and the reader, the ruler and the subordinate, the pre-war and the post-war, we will uncover a new style of critique and dialogue between everyday personal life and war.

Key Words: war, diary, air raid, movie, Empire of Japan